

人大建议确定政府性收入总规模

马光远:政府性收入不是越多越好,也不是越少越好,关键在于做好收入分配

核心提示

全国人大常委会23日听取了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作的关于围绕编制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开展专题调研工作情况的报告。其中,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专题调研报告中建议。预算工作委员会在报告中深入研究了“十二五”期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等重要问题,并建议配合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改革,合理确定政府性收入的总规模和总收入,实现政府收入、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均衡增长。 新华社

对话

就政府性收入规模、持续性问题,快报记者与致力于公共政策、资本市场和公司并购研究,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的经济学家马光远进行了对话。



马光远

并未过高,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?

马光远:我觉得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,要看怎么来解读。比如,有些专家说,我们的税赋还是比较低的。有些话你或许能骗老百姓,但是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搞得非常清楚了。我们对税赋本身有几种说法,有宏观税赋,有中观税赋,还有微观税赋,从大的概念来说,我们的税赋绝对不低啊。从收入的角度来讲,是政府性收入占GDP的比例,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,还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,这几种概念是不一样的,如果我们讲的这个收入本身是政府全部收入的话,情况是了不得的,我们现在讲的仅仅是预算内的税收收入加其他收入,但是并没有把政府的全部收入算在里面,你这个算法是非常重要的,不能只算小账,不算大账,不能只算工资,不算奖金和福利啊,不算公务消费啊。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。

现代快报:现在强调要重点增加地方政府收入,这又怎么理解?

马光远:这就涉及到分税制了。中央拿的太多,地方拿的太少,但是地方又承担了最多的地方性事务,这种情况肯定是需要扭转。

简单和别人比较比例无意义

现代快报:现在对降低政府

财政支出的呼声很高。

马光远:从支出的角度来讲的话,政府收入上来之后,绝大部分用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民生支出,用于公民的社会福利,我们所谓的社会保障比如说养老、医疗、住房等,这部分的支出比例在一些国家是非常高的,其政府收入差不多60%左右都是用于正儿八经的民生支出,而不是我们现在泛化的民生,比如说修路也成了民生工程。人家是真正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,但我们实际上是很少一部分用于老百姓身上。收入的时候,你算的是小数,支出的时候你又算成大数,这个一进一出差距是很大的。协调财政收入的比例,这是很好的一个提法,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些问题。三公消费大家都知道,但是最具考验性的是存在这个事实却隐瞒。

现代快报:在专家那里,“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”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得出的结论。

马光远:政府收入是一个方面,关键是政府怎么支出。这是一个需要全方位考虑思考的问题,里面千头万绪,可能都没理顺,收入上没理顺,支出上也沒理顺,简单地和别人比较比例,有什么意义呢?

现代快报:在您看来吗,政府性收入的持续性如何?

马光远:如果从一个上市公司

的角度来看的话,我们政府收入的持续性还不是很好,多元性还不是很好。

靠房地产不是长久之计

现代快报:现在很多人批评政府性收入对卖地的依赖,并认为是缺乏可持续性。

马光远:很多地方对卖地的依赖性确是很强,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50%以上。只能说明,我们经济的空心化、房地产化,只能靠它了,制造业交不了多少税,给政府回馈不了多少钱。整体上反映的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们现在之所以对房地产这么依赖,当然有政府的很多利益在里面,但是最根本的是,如果说制造业也有暴利的话,政府肯定会支持制造业或其他产业的发展。关键是其他产业现在呈现出萎缩情况,无论是就业还是价值,做的都不是很好。

现代快报:这方面现在应该怎么做才合适?

马光远:我们现在要做的,不是说政府收入高我们就必须把它弄下去,而是说要真正将经济做实,发展其他产业,把其他产业的创收能力、回馈能力、创造利润的能力提上去。靠房地产不是长久之计,地总有一天要卖完啊,你总不能透支吧? 快报记者 刘方志

高端语录

“要进行税制改革,重新设计我们的税种,重新设计我们税收的分享比例,重点是要健全地方税的体系,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,要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限。”

——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24日表示

“今年政府收入可能超15万亿。”

——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7月表示

政府性收入不能只算小账

现代快报: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合理确定政府性收入的总规模和总收入,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?政府性收入少点好还是多点好?

马光远:这还是我们常讲的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部分,建议中的提法早已有之。政府性收入,不在“多少”,不是越多越好,也不是越少越好,关键是做好收入分配。

现代快报:前一段,财政部专家回应国富民穷论时表示,财政收入

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

博士泡沫化足见教育之失败



《长江日报》8月25日报道,我国在读博士生数量10年增加19万人,从1999年的5.4万增加至2009年的24.63万。

这个数据,与同期的GDP增长率基本保持了同步水平。同期,我国GDP增长了5倍,在读博士生数量增加了4.56倍,增长幅度没落下太多。要是知道GDP增长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荣耀,应该更能教育的迅猛发展而自豪。很多国人骄傲地称之为“中国模式”,底气之由来,

就是GDP增长得快而且时间保持得长。教育的迅猛发展,应该也算是负于“中国模式”的吧。

另一个数据,甚至可以使教育的成就显得更重大。中国的GDP是在今年二季度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的,离美国还远。而中国的博士学位授予数,已在2008年超过美国,独步全球。这就是说,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,已经与煤产量、粗钢产量、粮食产量、服装产量、网民人数等等一样,到达了世界第一的位置。

很久以前,我就知道,拿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大学来比,最有把握胜出的便是学生和教授的数量。新世纪以来,建设“世界一流大学”有段时间了,“211”、“985”之类代号工程在推进。而众多大学排名机构,无分国际国内,都在显示中国的顶

尖大学也在稳步沦为亚洲二流。北大校长许智良直言“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”。

但无论如何,有最多的教授,就可以培养最多的博士,这有什么问题呢,“同步发展”而已,何况,中国的教授有一个人带47个博士生的能力,虽然这些博士生也许一年都见不着教授的面。

如果我们没有在意GDP中有多少是粗活贡献出来的,那么,专要教授和博士具有国际认可的水平,教育界一定要大呼冤枉。一个见到大数据就欣喜的国家,制造出更多的院士、教授、博士,就算是自娱自乐,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嘛。发展有“中国模式”,教育当然也是与之匹配的。

“宽进严出”好,还是“严进宽出”好,这是迂腐的问题。对大干快上和制造好心情来说,都不

好,只有“宽进又宽出”才好。

GDP增长,有时意味着生态危机、环境破坏的扩大。更多的教授、更多的博士、更多的大学生,应该算是“无烟工业”、“绿色GDP”,但教育之失败,对精神环境、文化生态、社会心理的影响,恶劣性并不弱于GDP崇拜对生存基础的破坏。

教育失败使人难以对未来寄予希望。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,而且是未来的再生产,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方式,生产着社会的知识能力、观念形态、文化态度乃至制度机理。产业化最充分,发展最迅速;分不清混乱还是成就,辨不了诡异还是创新;有最多的大学毕业生,却缺乏最基本的阅读人口;有最多的博士产量,却少见以学术为职业的人;有最多的院士和教授,学风却一塌糊涂……这难道就是教育的“中国模式”? 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)

热点纵论

如果招办就这样破格……

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国学天才孙见坤。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,陕西省招办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。他们表示,“博雅杯”国学竞赛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“破格录取”,所以“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”。 (8月2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这件事争议很大,有人认为这是录取体制过于僵化,有人则认为,制度严谨是保证公平的前提。这里不妨作个假设,如果陕西省招办破格放行,结果会怎样呢?

首先从风险角度来看,破格录取之后,复旦和孙见坤自然欢喜,可招办却很可能要承受较大风险。差6分可破格投档,这个口子一开,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“关系户”、“太子生”通过此路径进入大学?这并非杞人忧天。在现有社会环境下,高招腐败屡见不鲜,高招公平受到严峻挑战,这种情况下,谁知道口子一开后会怎样?

从收益角度来讲,既然招办要承担这么多风险,那么其收益何在?说实话,寥寥无几,说不定会被人骂得更厉害。大家会认为招生公平受到了侵害,怀疑招办搞暗箱操作。这样一来,你叫陕西省招办找什么地方说理去?

这样一比较就很容易看出,破格放行的风险与收益是不成比例的,在这种情况下,招办怎么可能轻易放行?相反的,严格执行相关规定,至少从台面上,大家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因此,要想招生制度有突破,要想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能真正发挥作用,关键是调整招办和招生单位的风险收益分配关系,通过制度性的手段进行平衡。另外,需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,堵死招生潜规则滋生的土壤,恐怕唯有如此,才能避免偏才在口水战中离心,高校越来越远的怪事发生。素质教育的理念,在高招阶段才能体现。在制度没有彻底改善之前,那种破格录取,还是免了吧。 (丁洪峰)

中国观察之潘多拉专栏

“花钱买稳定”是危险的恶性循环



作为一个财政比较困难的县级市,广东廉江市去年用于综治信访维稳的财政投入高达3100多万元,为过去5年的总和。今年,该市又将公安公用经费提升至每年人均3.8万元。廉江市委书记许顺说,要舍得花钱“买”稳定。

(8月25日《南方日报》)

为了证明钱花得不冤,廉江市拿出了一组数据:今年以来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,去年群众到湛江集体上访为零,到省进京集体上访同比分别下降58.9%和25%。如果单看这两项指标,不能不说,“花钱买稳定”很成功。

然而社会稳定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真正的社会稳定,需要以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、完善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成熟的法治环境为基础。即便是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少了,也要看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的。廉江市创立“维稳飞虎队”等等,采用的大多是用强力控制、封堵、威慑的手段,包括许多地方都

屡试不爽的“截访”手段。很显然,如果只有这些手段,那无异于在一锅沸汤上拼命加盖子,只是压住而不是解决了问题。

有意思的是,就在廉江市宣布“花钱买稳定”经验的前两天,广东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却在炮轰中山市维稳开支过大。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标泉表示,教育等投入转低,公共安全却不断增加,令人堪忧。中山市的维稳投入不断增加,尚且要以教育等投入转低作为代价,廉江市不及中山市发达,他们的维稳投入大幅度攀升,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势必持续转低,这种情况只会比中山市更突出。

既然社会是一个综合系统,

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。如果一方面把主要的精力、时间、人力、财力都用于维护表面的稳定,另一方面,在基础教育、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却不断下降,对协调社会利益、完善社会结构、改进社会政治生态等问题更是无暇顾及,久而久之,表面稳定之下的各种实质性社会问题势必日渐突出。最终,很可能陷入“(表面性)维稳投入越多——(实质性)社会问题越突出——维稳压力越来越大——(表面性)维稳投入越来越多”的恶性循环,其严重的后果不堪设想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